

「王八」、「Wombat」，你是誰？ Saussure 符號學的啓示與限制*

蔡 珮**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 Saussure 是如何從符號結構中尋找「意義」⁽¹⁾的？同時指出 Saussure 符號觀之侷限，探討在使用語言或符號溝通過程中之意義，是否僅從符號內部靜態結構就能夠掌握意義。耙梳 Saussure 的符號學思想後發現，Saussure 認為符號的「意義」來自於符號價值的決定，而符號價值又從符號結構中複雜的差異性比較、負面定義、毗鄰軸與系譜軸交會以及部分與整體之相互作用而來。Saussure 符號觀之侷限，在於他忽略了人、符號和符號指涉客體間三元互動關係所形成的詮釋符號，也忽略了「語境」也是意義之重要來源。

關鍵詞：Saussure、符號學、結構、話語、意義、價值

* 本文承蒙鍾蔚文教授的費心指正與啟發，以及《中華傳播學刊》編輯與共同研讀 Saussure 符號學同班同學的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 中國技術學院資訊傳播系專任講師、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候選人。
E-mail: tsai.weng@msa.hinet.net

壹、前言

人類的溝通是一種傳播現象，當我們使用文字、語言或符號和他人溝通時，不論是單向或雙向的溝通，我們都有一種期待：希望對方可以瞭解我的意思。但是，我們會發現誤解仍然時時產生，甚至有時會引發衝突，這會否是我們沒有掌握透過語言符號溝通時所產生的意義呢？

人類透過語言或符號和他人溝通、認識世界，首先要掌握的就是語言符號的意義。但究竟在判斷符號意義時需要藉由哪些因素來確認其所指為何呢？Saussure (2002: 11)曾以兩個使用語言溝通的人為例，該過程中涉及：聲音與概念、生理與心理、個人與社會、歷時與共時等一體之兩面因素，從任何一面來研究語言都無法釐清語言的「意義」。因此，Saussure 提出解決之道為：研究語言必須主要從語言結構下手，而非偏向個人心理或偶發多歧異的話語(parole)(Saussure, 2002: 9-12)。Saussure 在掌握人們語言傳播的「意義」時，他的分析策略是將語言(langue)與話語分開，也就是將社會與個人分開，將主要與次要分開(Saussure, 2002: 13-14)。從這裡不難看出，Saussure 認為語言結構在語言中扮演關鍵角色，「意義」存在於語言結構中，要解釋人們溝通時語言的「意義」，要研究主要的語言結構，而非次要且偏向個人層面的話語。

然而，人們使用語言或符號溝通時，意義真的只需要透過語言結構就可以釐清嗎？Saussure 認為，若沒有能指與所指接觸所產生的符號，世界其實是混沌一片的(Saussure, 2002: 110)。於是，從 Saussure 的觀點，我們發現直接研究語言中的概念或意義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意義」存在於語言結構中，這或許是釐清意義的一種角度，但是，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思考：如果只靠語言或符號的結構分析，意義就能釐清嗎？有沒有什麼其他和語言符號相關的因素需要一併考量？Saussure 的符號學能夠給予我們什麼啓示？又會造成哪些侷限呢？

Saussure 的符號結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分類系統 (Saussure, 2002:

10)，關心的是符號與符號間的關係，排除了「外在客體」、「人」和「符號」間三者的互動，以及「語境」這些和意義有關的元素，會否使得在尋找意義的來源時，產生分析單位不夠完整的缺憾？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於指出 Saussure 的符號結構觀如何幫助我們尋找意義，同時又面臨哪些侷限，並提出在研究溝通中符號的意義時，納入哪些因素將有助於吾人掌握語言溝通中的意義。

貳、Saussure 符號學的啟示：「意義」存在於語言結構中

舉一個生活中的例子，我現在要介紹一種澳洲特有的動物「王八」(Wombat)給其他人認識，尤其是從來沒有見過「王八」的人，他們如何理解我所傳達的「王八」是什麼呢？我對未曾到過澳洲或沒聽過 Wombat 的人問起：「你有聽過『王八』嗎？」，不少人的反應是：「是在罵人嗎？」、「難不成是烏龜嗎？」我爲了讓彼此的想像更接近，我再進一步描述：「牠是澳洲的稀有動物『袋熊』，和無尾熊同種，屬於有袋熊科哺乳類，牠長得有點像『迷你豬』，毛色是褐色夾雜灰色、淡黃色和黑色的斑點。」這樣的一段描述，可以從中掌握「王八」何所指嗎？

Saussure 的符號觀認爲外在世界（或外在客體）是透過符號間的關係被分類釐清的，而且，他也對符號使用者存而不論（Singer，1984：42；轉引自 Jensen，1995：13）。Saussure 一開始便破除一般人的想法：以爲語言和外在世界存在著一對一的對應關係，符號連結的是外在事物 (thing) 和名字 (name)；他重新提出語言符號有如一張紙，紙的兩面連結的是「概念」(concept) 和「聲音形象」(sound pattern)，前者爲所指 (signified)，後者爲能指 (signifier)，兩面都是心理實體 (psychological entity) (Saussure, 2002: 66-67)，這是語言結構的雛形。在所指和能指結合之前，外在世界只是一團模糊不清的星雲，若沒有能指與所指任意結合成的符號，我們就無法清楚地釐清兩個概念，沒有任何概念是事先建

立的(Saussure, 2002: 110)，進而他從符號的內部系統來解決在判斷「意義」時所面臨的分析對象難題，他將「意義」與「價值」區分開來，因為他認為若不仔細釐清兩者的差異，得到的「意義」只是一個字面或字典上的意義（例如：法文 mouton “羊，羊肉”=英文 sheep “羊”字的意義），但若以「價值」作判斷，則會發現 mouton 在法文中的價值，和 sheep 在英文中的價值不同，因為英文還有 lamb “羊肉”這個字相對於 sheep，因此，「價值」並不能等同於字面或字典上的意義(Saussure, 2002: 112-114)。所以，Saussure 所指的符號「意義」，並非單由能指與所指的交換而確定，還必須考慮同系統中符號所處的價值位置而定。

一、「意義」由符號價值決定

Saussure 將符號視為一個價值系統，和經濟系統一樣，符號是一種在不同事物秩序間的對價系統，在語言學上即能指與所指間，在經濟學上則是工作與工資(Saussure, 2002: 80)。「在任何情況下，我們會發現，概念都不是預先給定的，而是發自語言系統的價值。」(Saussure, 2002: 115)

Thibault (1997)認為，Saussure 企圖用價值來展現語言並非透明傳遞「意義」之媒介，而是透過語言內部生產價值的關係(value-producing relations)，「意義」得以建構。Saussure 不從命名學的角度來探尋語言與外在真實的對應關係，反而是從一個不同的角度發問：語言系統中的內在生產價值關係，如何使得語言使用者去建構和解釋語言形式和世界之間的關係 (Thibault, 1997: 164)？因此，我們可以得知，外在世界並非原本就劃分清楚等著語言來命名，但是，語言內部結構所產生的價值關係是如何建構「意義」的呢？

Saussure (2002)指出語言系統中，任何符號的價值都是依賴其他符號共同存在的結果。那麼，價值本身又是什麼呢？Saussure 先跳開語言，指出任何價值似乎都受到兩個原則所支配：一為不同的(dissimilar)東西，可以和一個價值待估的東西交換(exchanged)；二為類似的(similar)

東西，可以與價值正在被考量的東西進行比較(compared)(Saussure, 2002: 113)。筆者綜合 Saussure 的文意圖示，將他的概念綜合如下圖所示（參考自 Saussure, 2002: 113）：符號的價值來自於能指與所指的交換，也來自於符號與符號的比較。



圖一：符號「價值」的比較與交換圖解

舉例而言，要確定五法郎硬幣的價值，除了確定它可以交換同等價值的不同東西（如：麵包）之外；還要比較它在同樣系統中和其他類似之物的價值（如：同是貨幣系統的一法郎或一美元）(Saussure, 2002: 113)。這也就是 Saussure 認為符號的「意義」並非來自它和外在世界的一對一的對應關係，而是系統中的差異關係來產生「意義」。從這裡我們發現當人們想要和他人溝通時，能指和所指必須相互結合轉換，才能傳達「意義」；然而，「轉換」「意義」的產生似乎必須先來自「比較」的「意義」，也就是能指和所指兩方面都在各自的系統進行差異比較後，再任意性地結合在一起。所以，當我們聽到「マ」(馬)的時候，我們知道它不是「カ」(驢)、不是「カ」(驃)，因為在能指和所指兩個各別系統中的差異比較，然後再任意性地交換了能指與所指，因此我們知道「馬」是什麼。

Saussure 給我們的啟示是：理解「意義」的真諦，其實是先分辨出語言的「價值」，而非直接由字的概念或字典中一對一的字義解釋而來，字的「意義」是先從比較價值而後再從交換價值而來。而且，語言價值

或許並非如貨幣價值一般可以找到完全相等的價值互相交換，所以，要瞭解一個語言或符號的「意義」，就必須進入其所處的語言結構中去體會。

二、「意義」存在符號結構中

價值從符號結構而來，不過，要如何從符號結構中確定「價值」、找出「意義」呢？筆者以為，Saussure 的符號結構有四層限定「意義」的方式。Saussure (2002)認為，一個字的價值是從其周圍的字所決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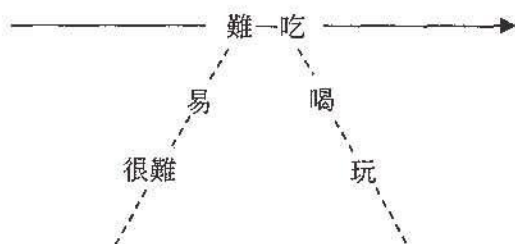
如果不從該字周圍的要素來指認，是沒有辦法確定該字的價值的。(Saussure, 2002: 114)

這是第一層的限定，第二層的限定是：價值是從負面被定義的，Saussure 說：

觀念都不是預先給定的，而是由語言系統發散出的價值，如果我們說價值與概念相同，一定必須是純粹差異性的(differential)，也就是說，概念不是正面被定義的，而是在同一個系統中從負面被定義的。(Saussure, 2002: 115)

第三層限定是 Saussure (2002: 126)將能指與所指的系統擴大，指出符號間的差異性來自兩種延伸的系統：毗鄰軸(syntagm)和系譜軸(paradigm)，兩軸的交會點形成符號的「意義」。毗鄰軸是一種橫向的線性組合關係，它的序列結構限制了元素的選擇，使各元素共同出現在一個文本中時彼此牽制，組合的方式通常是約定俗成的；系譜軸是一種聯想關係，指能夠互相替換的元素間之對比，也是一種選擇關係，它會涉及文本中不在場元素的對比(Saussure, 2002: 122-132)。

舉例而言，當我們聽到：「難吃」時，分別從這兩個字的毗鄰軸與系譜軸的結合點，我們可以分辨其「價值」，得出其「意義」，如下圖所示：



圖二：Saussure 符號「價值」的第一層到第三層限定圖示

首先，我們要確定「難」字的價值。我們沒有辦法從單一個「難」字本身去判斷它的「價值」，也無從得知其「意義」。因為，如果「難」字周圍只有一個「易」字和周圍又多出個「很難」、「稍難」等詞，「難」字的價值就會有程度上的不同，進而產生不同的「意義」。所以，我們必須先分辨這些字詞間的差異性，然後再進一步發現「難」不是「易」，不是「很難」、「稍難」，因此，「難」字沒有實質上的價值，它的價值是由其周圍字詞的比較中從負面被定義的。「吃」的價值判斷也是如此，經過系譜軸的聯想選擇和毗鄰軸的語法約定俗成的線性組合關係，「難吃」的詞語價值從兩軸的交會點中產生，這樣的交會點不會產生「吃難」這樣的詞語，因為約定俗成的毗鄰軸不會產生這樣的組合價值。

不過，這樣就可以判斷「難吃」的意義了嗎？這裡就牽涉到毗鄰軸和系譜軸整體的界線在哪裡？這是判斷價值的困難所在。

Saussure (2002) 很周全地更進一步說明，價值並非只是經由差異性比較出的交會點，也包括部分和整體的交會點：

毗鄰軸的關係中，部分和整體的關係與元素間彼此的關係一樣重要(Saussure, 2002: 126)。在語言結構中，一切都來自差異，也來自集合(groups)。(2) (ibid.: 127)

這是第四層的限定，是詞素和詞素結合後，它們的價值來自於一個

較高單位的相互作用。Culler(1984)也指出，語言在其結構的各個層次上，如果要確定語言單位的同一性，就要根據這些單位在高一級單位中的區分作用（引自張景智，1993：42）。例如將法文 *mouton* 翻譯成英文時，要選擇 *sheep* 或 *lamb*，得根據高一級的單位（如：句子）：「這道羊肉燴飯很好吃」，從毗鄰軸共時性的比較限定中，我們知道要從系譜軸選出 *lamb* 作為 *mouton* 的交換「意義」。由此可知，我們在上述「難吃」的舉例中，如何判定「難吃」是指味道難吃還是太硬不好咬？這就必須來到第四層更高單位的句子中，例如：「這道菜難吃地令人想吐」，或是「這牛肉煮太老了，很難吃」，這兩個句子中的「難吃」，就因為更高一層的句子不同，而有不同的「價值」，因此「意義」也不同。

綜上，符號的「意義」來自於符號「價值」的決定，而符號價值又從符號結構中複雜的差異性比較、負面定義、毗鄰軸與系譜軸交會以及部分與整體之相互作用而來。從 Saussure 的觀點，「意義」是存在於符號結構中，透過符號的任意性結合與差異性對比，「意義」由此而生。

從上述符號學的啟示，回到「王八」的例子，我們會發現，從 Saussure 的觀點，要瞭解「王八」的意義，首先，我們必須將其置於發音類似的翻譯語言系統中，而非講話語言的系統中判斷其價值，因而，我們知道「王八」周圍的字不是那些「罵人的話」、不是「烏龜」，「王八」是用「發音」近似的符號系統作差異性比較，找出可互相交換的價值所形成的符號；其次，是「Wombat」與「王八」、「袋熊」的交換，在中文裡其實根本沒有「袋熊」這種動物分類，「袋熊」的翻譯是比較在澳洲動物符號分類系統中「有袋類」、「熊科」等差異，發現台灣動物符號系統分類也有這樣的類別，在價值幾乎等同下，交換結合而來的動物名稱，在毗鄰軸的限制下，我們不會說「熊袋」，而是說「袋熊」，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王八」是什麼。不過，我所質疑的是：這樣的理解，會不會也還只是停留在「符號」層次的理解呢？即使我再多拿出一張 Wombat 的照片，各位所理解的 Wombat 和我所見到或傳達的 Wombat 意義是否一樣呢？會不會各位只是接收到一個名詞「Wombat」而已呢？會否得

等到某一天，各位也見著了 Wombat 的本尊，接收者將「王八」這個符號和它所指涉的客體（Wombat 這個動物）親自連結起來，我們彼此所理解的符號意義才會是最接近的時候？那麼，意義難道不會存在於符號使用（接收）者對符號與其客體的互動詮釋中嗎？在理解「王八」為何時，難道不用考慮語境的問題嗎？這也就是接下來我要討論的 Saussure 符號學研究意義的侷限。

參、Saussure 符號學研究意義的侷限

從 Saussure 的符號觀點來找尋溝通中符號的意義，雖有啟發，但卻會面臨三個難題：系譜軸的取舍判準、語境和語言結構的範圍。第一，Saussure (2002) 曾經舉例儘管火車、車廂或司機不同，我們仍可從列車系統——火車時刻表——判斷出同一列八點二十五分從日內瓦開往巴黎的火車。但是，這裡有一個前提未明，就是系統中可能存在著眾多判準（或者說有眾多條系譜軸），溝通雙方是如何取系統中的“同一個標準”來作為意義的判準（或者說雙方如何會將同樣的元素放在同一條系譜軸上）？如果今天對話另一方在列車系統中取的是「火車頭的年份」，那麼，判斷同一個火車的意義就會隨之改變。也就是說，溝通雙方如果採取不同的系譜軸或是採取不同的語言系統判斷價值，意義的理解就會產生誤差。因此，在判斷溝通中的符號意義時，只從語言結構似乎太過靜態，若排除了聽者與說者之間的互動及其當下所處的語言情境等因素，當我們聽到：「你這個『王八』真臭！」時，有辦法掌握這句話的意義，甚至是「王八」所指為何嗎？

這裡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如何知道「王八」指稱的是“Wombat”還是“罵人的話”呢？在澳洲帶團的導遊口中說「王八」與在台灣和人吵架的情境中說「王八」二字，符號雖一致，但意義卻不同。Saussure 的符號結構過於靜態，如果我們僅從符號這個自給自足的系統來尋找意義，有時可能會誤判。因此，「語境」因素應納入判斷意義的來源之一，「語境」

包括：人對符號的詮釋、互動中兩人對話的動態以及語言當下的情境。

先談人對符號的詮釋。比方說「失戀讓我感到心痛。」這句話，彼此對「心痛」這個客體的感覺如果程度不同，或是其中一方從未失戀過，如何從語言結構中得出相互理解的意義呢？Fiske（1990，張錦華等譯，2003：68）說的很貼切，意義並非被包裹在訊息裡不變的概念，意義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意義有其歷史性，會隨時間流轉而改變，甚至我們可以放棄「意義」這個字不用，而採 Peirce 所用的更生動的字眼：「表意行爲」(semiosis)。(3) 因此，要找尋意義，不只是從其符號結構而來，還有人和符號互動後產生的衍生詮釋符號，詮釋符號並非僅由符號結構而生，它是人和符號、符號指涉客體三元互動的結果。

動態的對話情境和當下的語境也是判斷意義來源的重要因素。Bakhtin (Volosinov, 1973) 就認為，意義存在於語境中。Saussure 取語言結構作為意義的判斷時，排除了個人的話語(parole)，因為他認為話語是屬於個人且多歧異的，但 Bakhtin 認為話語也是社會性的。Bakhtin 質疑 Saussure 語言系統是否真的相對於說話者的主觀意識而客觀存在？他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說話者的主觀意識會和語言一起工作，說話者應該考慮到聽話者和理解者的觀點，語言的規則一致性才會有效。理解基本上不會歸結瞭解說話者所運用的語言形式規則，而是在具體的上下文中理解它，在話語中瞭解它的意義 (Volosinov, 1973)。因此，理解意義必須回到話語中，考量對話雙方的關係、說話的情境，從對話的互動中才能掌握意義。

不過，Saussure 似乎不會因為上述的質疑就被打倒，他還有最後一層意義限定的絕招，就是「詞素和詞素結合後，它們的價值來自於一個較高單位的相互作用」。但是，這個「較高單位」的界線在哪裡？結構的範圍在哪裡？是判斷價值的困難所在，因為我們知道：符號的價值會受到其周圍符號數量的增減，而有不同的價值，因而產生不同的「意義」。陳世敏教授(2002: 82)曾經提出傳播學的大問：「意義在什麼文化脈絡之下如何形成？」Saussure 將判斷意義的範圍侷限在語言結構中，

筆者懷疑的是：文化脈絡真能完全縮影於語言結構中嗎？例如：在大陸有些地方說「難爲你了」是表示「謝謝你」的意思，在台灣則是另有其義，這主要是文化不同所形成的差異。同樣一個符號的意義，可能因爲它置於一個句子、一本書、一個語境、一個社會、一個文化……等等逐漸擴大的脈絡中，產生不同的符號價值決定「意義」。因此，「較高單位」的範圍可能溢出符號結構之外。

綜上，我們從 Saussure 的侷限中，發現考量溝通中符號的意義，不能僅靠符號結構，尚須包括：人和符號、指涉客體間的三元互動關係，還有語境的問題。結構式的語言分析存在著一種缺陷，就是當 Saussure 將語言系統和話語分開時，就注定了偏頗的開端，因爲他將語言系統獨立於人之外，是自給自足、自成一格的系統。Bakhtin 主張要回到具體的情境中掌握語言的意義，字是對話雙方相互關係的產物，說話者根據他對說話主題的態度，加上他對說話對象的評價，決定了要選擇哪些語言形式和傳播型態（鍾蔚文，2004：211-212）。從 Bakhtin 的觀點，我們可以發現，即便是話語，其形成都是由社會關係所決定，其規律的來源不在個人內部，也不在語言系統中，而是環繞在對話雙方的社會環境中，這個「語境」正是意義得以生成之環境。因此，研究意義不僅是進入符號結構，還必須進入當時所處的語境中。

肆、結論：探索溝通中符號的意義，意義不只存在於符號結構中

人類運用語言符號相互溝通時，我們可以先從 Saussure 的符號觀掌握符號結構中的價值區分，從能指與所指兩面的差異性，由負面來找出該符號的價值；進一步確認意義時，我們是從差異性延伸到毗鄰軸與系譜軸的交會點來尋找價值，此時，如果彼此所處的語言系統不同，就必須先比較彼此所遵循的毗鄰軸限定爲何，尋找能夠對等交換的法則，

因為每種語言（文法）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組織世界；而如果溝通雙方處在同一社會文化脈絡，某種程度上會遵循共通的文法規則，從這裡可以找到文本明示義中的客觀意義。但是，在字詞的選擇上會摻雜主觀的成分，此時，在符號層次上，溝通雙方應比較彼此所選擇的系譜軸之異同，彼此在什麼基準點對符號進行選擇，也就是進行 Saussure 所謂的價值比較，要釐清彼此所選擇的系譜軸是否為同一條，系譜軸上的組成元素是否相同？最後，意義來自於整體對部分的限定，這是一步步分析尋找意義的方法，同時要納入 Bakhtin 的語境問題，且人在語境中是如何與符號以及符號的指涉客體互動，衍生出承載意義的詮釋符號，同樣也是意義來源之所在。

行文至此，現在如果我說：「那個小『王八』跑過來了！」，這「王八」指的是什麼呢？各位應該無法只從符號結構就想掌握我所指稱的「王八」是誰吧？如何才能掌握我所表達的「王八」意義呢？相信分析的方式應該需要包含：符號結構、人與符號和指涉客體的三元互動詮釋符號以及環繞在周圍的語境互動分析。意義的研究顯得饒富趣味，也十分困難，如果，傳播學在意義研究的領域深耕，會否產生解決傳播根本問題的經典理論或思想呢？

智慧藏

註釋

- (1) 本文“意義”一詞出現頻繁，大體分為三種不同的指涉：一為 Saussure 所指稱的「意義」，在文中以引號標示「意義」作為區別；二為字典的意義，於文中會直接陳述這是字典或字面的意義；三為本文探索的意義，即在溝通中的語言符號意義，不多作任何引號或特別說明。
- (2) 即前述部分與整體之關係。
- (3) 表意行為可以理解為符號的詮釋過程，該過程涉及 Peirce 所提的符號三元關係：符號、該符號的指涉客體(object)與該符號的詮釋符號(interpretant)。根據 Peirce 的解釋：「符號向人作表達，即是在某人心中創造出一個等同的符號，或是一個更進一步延伸的符號」(CP 2.228)「符號決定(determines)了它的詮釋義，參照(refer)了它的客體，用同樣的方式，詮釋義也依序形成一個符號，如此無限地持續(ad infinitum)」(CP 2.303)。Eco(1979)解釋得很好，「……客體的第一個再現就是詮釋義，但是無盡的再現序列可以想成有一個絕對的客體作為終結，Peirce 稱此『絕對的客體』並非一個客體，而是『習慣(habit)』，『習慣』被理解為最終的詮釋義……最終的符號【詮釋義】並非真的是一個符號，而是一個作為符號彼此連結的語意結構……一個無盡的表意行為結構(a structure of unlimited semiosis)」(Eco, 1979: 69; 可參考 CP 4.536; 5. 473-492)。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詮釋過程對於符號的意義至關重要，而且，要掌握的是詮釋過程中的動態三元關係，並非僅是符號的結構而已。

參考書目

- 陳世敏 (2002)。〈提一個大問〉，《中華傳播學刊》，創刊號：81-85。中華傳播學會。
- 張錦華、劉容玫、孫嘉蕊與黎雅麗譯 (2003)。《傳播符號學理論》。台北：遠流。(原書 Fiske, J. [1990].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 鍾蔚文 (2004)。〈想像語言：從 Saussure 到台灣經驗〉，翁秀琪 (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上)，頁 199-264。台北：巨流。
- 張景智譯 (1993)。《索緒爾》。台北：桂冠。(原書 Culler, J. [1984]. *Saussure*.)
- Eco, U. (1979).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Jensen, K. B. (1995). *The social semiotics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Peirce, C. S. (1998).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 Hartshorne, P. Weiss, & A. Burks(Eds.),vol.1-8. Dulles, Va. : Thoemmes Press.
- Saussure, F. de. (2002).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12th Ed.)(R. Harris, Trans.). Illinois: Open Cour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ondon: G. Duckworth, 1983)
- Singer, M. (1984). *Man's glassy essence: Explorations in semiotic anthrop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hibault, P. J. (1997). *Re-reading Saussure: The dynamics of signs in social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Volosinov, V. N.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L. Matejka, & I. R. Titunik,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ombat”, Who Are You?

Enlightenment from Saussure's Semiology and His Limitation

Pei Tsai*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how Saussure finds meaning in the linguistic struc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point out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Saussrean conception of language, which, in my opinion, is restricted to a relatively static view of meaning. Saussure argues that meaning rests on the value of signs, which in turn derives from the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ce, negation, syntagm and association. Saussure fails to pay adequate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s among object, person and sign and therefore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

Keywords: Saussure, semiology, structure, parole, meaning, value

智慧藏

* Pei Tsai is a lecturer at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 Chung Ku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sinchu, Taiwan. Tsai is working on her Ph. D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